

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赵晓斐

(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移民流入促进了各民族思想、文化和理念的交流,带动了跨国经济活动的融合和发展,必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使用 2000—2014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研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流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指标度量与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均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有效;移民流入主要通过降低搜索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两种途径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制度质量越低的国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移民群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大。政策含义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发挥以外籍员工、留学生为代表的在华外籍群体的分工促进作用,凝聚文化力量,带动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生产分工。

关键词: 移民流入;全球价值链;逆全球化;生产分工;中间品

中图分类号: F74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29X(2023)05-0110-12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中间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发展,中间品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份额显著增加。但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生产分工的发展存在诸多“隐患”,贸易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涌现。2020 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给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新冠疫情以来,各国防控措施导致国际物流受阻,贸易无法正常进行,全球生产分工陷入严重衰退。各国推出的贸易刺激政策却成效微弱,单纯依靠政策等“硬手段”已不足以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

21 世纪以来,国际移民数量不断增长。截至 2020 年,全球移民总数已经达到 2.81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3.6%,相当于每 30 个人中就有 1 位移民^①。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现存的国际移民以外籍在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为主。2018 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 33.6 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 95 万人,来自于韩国、日本、美国、缅甸、越南、加拿大、法国、印度、德国、英国等各个国家,这部分移民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政治关系以及稳定的经贸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那么移民流入是否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

当前,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移民流入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新古典理论将移

基金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制造业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影响研究”(ZR2023QG051);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资助项目“‘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创新团队”(2021RW019);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资助项目“数字经济与国际分工重构研究创新团队”;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对外开放与自贸区建设研究基地(山东财经大学)。

作者简介: 赵晓斐,女,山东淄博人,博士,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数字贸易,国际生产分工。

^①数据来源:全球移民署,网址:https://www.unmp.org/。

民现象归因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1-2]。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地域分布不均是常态,劳动力会倾向于从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较低的国家移入劳动力资源稀缺、价格较高的国家,直到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消除了其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均。国际贸易中,伙伴国之间普遍存在着市场环境差异和政策变动风险,贸易不确定性较高,受劳动报酬驱动的移民流入将成为东道国特殊的要素禀赋,通过信息扩散效应,促进移民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增长^[3-9]。除此之外,移民流入还能通过母国产品消费偏好效应和强化商业信任效应等方式对双边贸易产生积极作用^[10-11],但异质性研究发现国际难民、团聚性移民和投资性移民流入对贸易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12],同时发达国家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13]。第二类研究为移民流入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首先,移民流入丰富了本地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能够降低企业劳动力雇佣成本,有利于扩大企业生产和出口规模^[14];其次,移民流入带来了额外的外部知识和技术资源,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重要要素,因而能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产生积极影响^[15-16];再次,移民流入还带来了信息资源,如企业所需要的出口市场情况、制度环境、经营条件、消费者偏好等相关信息,有利于降低企业对出口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17],从而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调整、出口目的地调整和出口规模等产生影响^[18-19]。

经文献梳理可知,移民流入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大多从信息成本和要素流动角度进行^[7,20],从移民流入角度解读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仍较为缺乏。而且移民流入除其信息扩散效应之外,同样有助于带动东道国文化“走出去”,促进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思想、理念以及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这种“软力量”能够广泛、深入且持久地对公众舆论、企业偏好和政府立场产生影响,必将成为推动国际生产分工合作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使用 2000—2014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研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明确移民流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从现实来看,如果能运用计量方法证明移民流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对逆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和提升分工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党的二十大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在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大背景下充分发挥在华外籍人员的作用,引领更多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不但有助于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从移民流入角度解读全球价值链分工,探寻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的新路径;第二,从搜寻匹配成本和文化好感度两条途径进行机制分析;第三,进一步考察了移民流入对制度质量不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差异性影响,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移民群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

二、机制分析

移民流入主要通过缩减搜寻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两条途径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

搜寻匹配成本方面,Stigler^[21]构建了搜索理论的基本框架,认为搜寻匹配成本源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产品资讯与交易对象资讯的搜集,搜寻匹配成本的降低能提高产品的可及性,可以使消费者找到更为稀有和更加合适的产品。Diamond^[22]将搜寻匹配成本引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提出了著名的“Diamond 悖论”,该理论认为搜寻匹配成本是引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因素。搜寻匹配成本同样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中语言、制度、文化等非正式壁垒普遍存在,这些天然劣势极大地阻碍了全球生产中的跨国分工匹配^[23]。移民流入将信息流、资金流以及物流等带入东道国,能够通过群体内部共享与外部溢出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扩大东道国生产商的供需搜寻范围和分工配置范围^[24],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枢纽。而且 20 世纪以来,知识性移民的数量逐渐增多,成为移民活动的主要形式,这些新移民的迁徙不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移民迁徙范围的扩大更有助于进一步弱化国家之间的空间地理限制。同时,移民流入有助于缩短搜寻匹配时间,提高搜寻匹配的效率,减少生产商之间的交易摩擦,提高生产分工效率。

文化好感度方面,随着全球要素流动的加快,文化、意识形态、国家形象、价值观念等“软力量”在贸易催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比较优势、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传统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软力量”是一国无形的力量资源,能通过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对他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全球化时代的移民迁徙承载着知识、技术以及文化,是国家间“软力量”认知、传播和交互的重要渠道。移民流入能充当东道国与海外联系的桥梁,通过东道国文化传播、正面形象树立、好感度提升等间接方式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文化好感度的提升有利于拉近两国间的心理距离,使企业之间更容易建立信任,减小经贸交流的障碍,从而有利于深化两国间的生产分工,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吃苦耐劳和知书达理的民族形象,可以通过在华移民的认同和传递提升国外企业对中国的好感和信任度,“中国年”“我眼中的中国”等短视频征集活动,通过示范、宣传和传播的形式,使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全球关注度不断上升。随着双边贸易逐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这种“软力量”越来越成为推动从产品设计、原材料提供、中间品生产与组装到成品销售、回收等所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分工的重要力量。

三、计量模型

(一) 基准计量模型

为研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本文利用“国家—行业—年份”三维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在现有研究^[25-29]的基础上,使用 Wang 等^[30]的前向分解法测度因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核心自变量是移民流入:

$$GVC_{ikt} = \beta_0 + \beta_1 Immigrant_{it} + \beta Controls + v_i + v_k + v_t + \varepsilon_{ikt} \quad (1)$$

其中 i 、 k 和 t 分别为国家、行业 and 年份。被解释变量 GVC 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解释变量 $Immigrant$ 表示移民流入,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行业劳动时间、行业资本存量、外国直接投资、固定资本比率和关税, v_i 、 v_k 和 v_t 分别表示国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为降低异方差,本文计量回归中的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二) 指标度量

移民流入:OECD 和联合国等机构均有对移民的统计数据。其中,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库每 5 年统计一次,目前仅有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9 年的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移民数据库为 OECD 国家 2000—2019 年的统计数据。为有效检验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际影响,本文采用 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发布的移民存量(按出生地)与总人口的比重作为移民流入指标。

全球价值链分工: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众多学者的研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25-29]。本文在诸多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前向分解方法度量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进行总效应分析^[30]。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度量的价值链分工指标更加全面,纠正了传统指标中的偏误,且以增加值为分母,使得价值链分工指标更加符合现实。前向指标构建如下:

$$GVC_f_{ikt} = \frac{V_GVC_{ikt}}{V_{ikt}X_{ikt}} = \frac{V_GVC_R_{ikt}}{V_{ikt}X_{ikt}} + \frac{V_GVC_D_{ikt}}{V_{ikt}X_{ikt}} + \frac{V_GVC_F_{ikt}}{V_{ikt}X_{ikt}} \quad (2)$$

其中, GVC_f 表示前向价值链分工。 VX 表示 GDP, V_GVC 表示隐含于本国生产的中间出口品中的增加值,又可分为三部分: V_GVC_R (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增加值),该部分仅跨境一次,为简单价值链分工($GVCS$), V_GVC_D (返回出口国被吸收的增加值)和 V_GVC_F (被进口国间接吸收或被第三国吸收的增加值),这两部分跨境两次及以上,为复杂价值链分工($GVCF$)。

控制变量:(1)行业劳动时间。总劳动时间越高的行业一般生产劳动密集型中间品,总劳动时间越低的行业一般生产资本密集型中间品。同一行业内,总劳动时间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一般越高。(2)行业

资本存量。资本存量作为全球生产分工中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会直接影响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3)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入能促进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提高,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推动力量^[31-33],本文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度量。(4)固定资本比率。一般来说,固定资本比率较高的国家,对第一、二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其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一般较低,本文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比重度量。(5)关税。关税作为重要的贸易边界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不言而喻^[34-36],关税的减免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本文以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库中所有产品特定税率下的税目份额指标(Share of tariff lines with specific rates,all products (%))度量。

(三)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内生性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移民流入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吸引移民进入;遗漏变量也会引起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使用工具变量解决估计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东道国的预期寿命作为移民流入的工具变量^[19,37]。其原因是:一方面,移民在作出移民决策时,会重点考虑东道国的环境和福利因素,预期寿命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一国的环境与福利水平^[37],当东道国的预期寿命较高时,移民的数量会增多,预期指标直接影响移民的迁移决策,满足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微乎其微,满足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四) 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维度为“国家—行业—年份”三维,选取 2000—2014 年样本。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数据来源于 2016 版 WIOD,核心被解释变量移民流入数据来源于 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移民流入数据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数据匹配过程中,因数据缺失删除了爱尔兰、以色列、冰岛、新西兰、智利、捷克、希腊、日本、韩国、波兰和葡萄牙 11 个国家,样本共保留 24 个国家 20 160 个样本(20 160=24 个国家×56 个行业×15 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数据维度及来源见表 1、表 2。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球价值链分工	20160	0.25	0.33	0.00	21.79
移民流入	20160	0.12	0.08	0.00	0.43
行业劳动时间	20160	452.47	1884.03	0.00	44324.00
行业资本存量	20160	169878.00	1216984.00	0.00	3.55e+07
外国直接投资	20160	4.14e+10	7.68e+10	-2.97e+10	7.34e+11
固定资本比率	20160	22.67	3.42	15.41	36.82
关税	20160	0.82	0.48	0.00	1.52

表 2 数据维度及来源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数据维度	数据来源
全球价值链分工	WWYZ 方法	国家—行业—年份	WIOD
移民流入	移民存量/人口	国家—年份	OECD
行业劳动时间	行业劳动时间	国家—行业—年份	WIOD
行业资本存量	行业资本存量	国家—行业—年份	WIOD
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国家—年份	WDI
固定资本比率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	国家—年份	WDI
关税	特定税率下的税目份额	国家—年份	WITS

图 1 是 2005—2014 年 WIOD43 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GVC)、简单价值链分工(GVC_S)与复杂价值链分工(GVC_F)的平均变化趋势图。本文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UIBE GVC)指标体系的测算方法,分别测算了简单价值链分工(GVC_S)和复杂价值链分工(GVC_F),简单价值链分工(GVC_S)是指中间品

直接被进口国吸收,仅跨境一次的国际生产活动,复杂价值链分工(GVC_F)是指中间品至少跨境两次,以满足国内或国外最终需求的跨境生产活动,包括本国增加值在中间品出口后又返回本国的部分和进口国对国外增加值再加工出口到其他国家的部分^[30]。由图 1 可以看出,2000—2014 年间,除金融危机期间的短暂波动之外,全球价值链分工(GVC)、简单价值链分工(GVC_S)与复杂价值链分工(GVC_F)均呈上升趋势,但 2010 年之后,价值链分工水平增速放缓,尤其是复杂价值链分工(GVC_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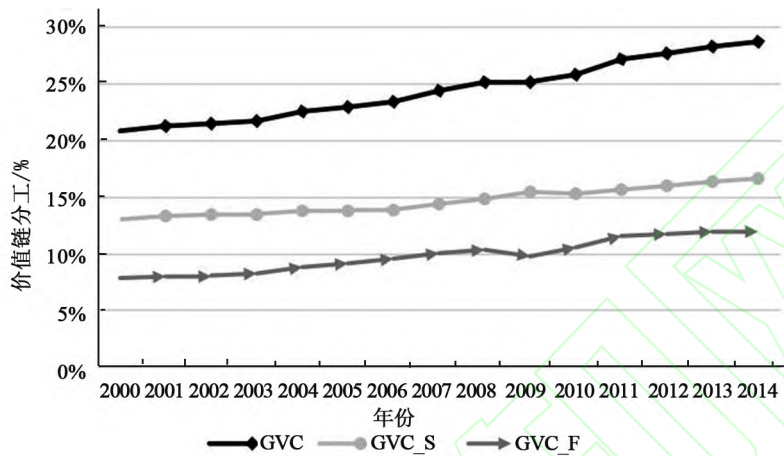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4 年全球价值链分工、简单价值链分工与复杂价值链分工的平均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UIBE GVC)。

图 2 是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散点图和拟合线。本文利用 2016 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出国家—年份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利用 OECD 数据库计算出国家—年份层面的移民数量占总人口比重,两个变量合并后选取 2000—2014 年样本做散点图和拟合线。由图 2 可以看出,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出现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初步判断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正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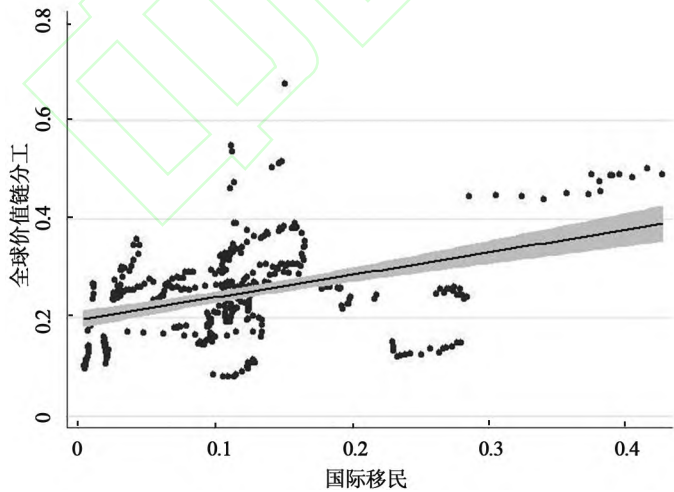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4 年移民流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散点图和拟合线(95% CI)

数据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四、基准回归及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列(1)是核心解释变量移民流入对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回

归,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移民流入提高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列(2)和列(3)是分别引入行业控制变量(行业劳动时间、行业资本存量)和国家特征变量(外国直接投资、固定资本比率、关税)的回归,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移民流入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论。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移民流入	0.0139 *** (0.0034)	0.0126 *** (0.0034)	0.0072 ** (0.0033)
行业劳动时间		0.0067 (0.0053)	0.0069 (0.0053)
行业资本存量		0.0080 *** (0.0029)	0.0080 *** (0.0029)
外国直接投资			0.0015 ** (0.0006)
固定资本比率			-0.0635 *** (0.0140)
关税			-0.0245 *** (0.0023)
常数项	0.0871 *** (0.0133)	-0.0317 (0.0323)	0.1356 ** (0.0516)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160	20160	20160
R ²	0.7001	0.7104	0.7121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经cluster处理过的标准误。下同。

关于控制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行业资本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行业资本存量越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越有优势。外国直接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后,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规模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38]。固定资本比率的系数显著为负,第一、二产业对固定资本的依赖性较强,其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一般较低。关税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预期。

(二) 稳健性检验

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验。首先,使用OECD国际移民数据库中的移民流量(Inflows of foreign population by nationality)替代基准回归中的移民存量指标进行计量检验,回归结果在表4列(1)展示;其次,使用移民流量与总人口的比重替代基准回归中的移民存量进行计量检验,回归结果在表4列(2)展示;再次,使用前向价值链分工中的复杂价值链分工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替代指标进行计量检验,回归结果在表4列(3)展示;最后,使用后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替代指标进行计量检验,回归结果在表4列(4)展示,后向分解表示最终品产出中,来自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加值占比,后向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构建如下:

$$GVC_b_{ikt} = \frac{Y_GVC_{ikt}}{Y_{ikt}} = \frac{Y_GVC_R_{ikt}}{Y_{ikt}} + \frac{Y_GVC_D_{ikt}}{Y_{ikt}} + \frac{Y_GVC_F_{ikt}}{Y_{ikt}}$$

(3)

式中,GVC_b表示后向价值链分工,Y表示最终品产出,Y_GVC表示中间品进口中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分为:Y_GVC_R(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出口国增加值)、Y_GVC_D(返回进口国的国内增加值)和Y_GVC_F(被第三国吸收的国外增加值)。

本文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移民流入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表4列(5)引入预期寿命作为移民流入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

显示,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估计是稳健可靠的。另外 Durbin-Wu-Hausman 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证明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1) 流量	(2) 流量占比	(3) 复杂价值链	(4) 后向	(5) IV
移民流入	0.0087 *** (0.0013)	0.0079 *** (0.0012)	0.0107 *** (0.0022)	0.0084 *** (0.0026)	0.2796 *** (0.0441)
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2309 *** (0.0712)	0.0937 (0.0612)	0.0656 (0.0502)	-0.0021 (0.0214)	0.4791 *** (0.0963)
Durbin-Wu-Hausman					163.159 [0.0000]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55.962 [0.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805.845 {16.38}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592	18592	19365	20160	20160
R ²	0.7175	0.7174	0.6666	0.7786	0.6541

注: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结果未列示,留存备案。下同。

五、机制检验

继续检验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机制。首先,从搜寻匹配成本角度进行机制检验,使 WIOD 中的中间品价格指数作为度量指标。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搜索匹配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中间品价格的下降,移民流入通过降低搜索匹配成本降低中间品价格。为避免受生产成本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回归中加入了国家—行业固定效应,控制了生产成本等国家—行业特征因素,回归结果如表 5 列(1)所示。另外,根据 Hellmanzik 和 Schmitz^[39]、刘斌和顾聪^[40]的研究,网络链接强度能较为精准地刻画全球生产分工下各国所面临的搜寻匹配成本,因而是搜寻匹配成本较好的代理变量。海外网络链接强度使用双边网络链接数据进行度量^[39],该数据通过分析各国网站所属的顶级域名对伙伴国的网络链接数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5 列(2)所示。移民流入对中间品价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对海外网络链接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移民流入在国际生产分工匹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降低搜索匹配成本,扩大分工配置范围,因而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其次,从文化好感度角度继续进行机制检验。文化好感度的度量方面,可由文化产品受喜爱程度衡量。本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测算了各国文化产品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一国文化产品出口占比越多,表明该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受欢迎程度越高,即文化好感度越高。表 5(3)列是移民流入对文化产品出口占比的回归结果,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移民流入提高了一国文化产品出口占比,移民在移居国民族文化传播和正面形象树立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异国企业建立合作信任感和深化经贸往来的重要力量。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1) 中间品价格	(2) 网络链接强度	(3) 文化产品出口
移民流入	-0.0194 ^{***} (0.0061)	0.1757 ^{**} (0.0812)	0.4326 ^{***} (0.0742)
行业控制变量	是	否	否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160	330	360
R ²	0.6761	0.5043	0.9648

六、拓展分析

移民流入对制度质量不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移民群体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什么异质性影响？本部分从制度质量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进行了拓展分析。

(一) 基于制度质量视角

一国制度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分工不确定性的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从制度质量视角检验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该指数采用百分制(0—100)的评分办法,评定了包括产权、政府诚信、司法效力、税收负担、政府开支、财政健康、商业自由、劳动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政自由在内的大类指标。这些大类指标的均值即是一国经济自由度的总体得分,得分越高,表示经济自由度越高。本文以经济自由度的倒数作为制度质量指标,引入移民流入和制度质量指标的交互项进行计量检验。

表 6 为基于制度质量的分析结果,其中列(1)是只包括制度质量、移民流入与交互项的回归,制度质量和移民流入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 6 列(2)和列(3)分别引入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和国家特征控制变量。制度质量和移民流入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制度质量越低的国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移民能够通过社会联系替代制度质量发挥作用,降低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增强国际生产分工的确定性,从而能有效提高制度质量较差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

表 6 基于制度质量的分析

变量名称	(1)	(2)	(3)
制度质量	-0.3886 (0.2763)	-0.2177 (0.2902)	-0.9908 ^{**} (0.3937)
移民流入	0.0052 (0.0032)	0.0049 (0.0032)	-0.0011 (0.0031)
制度质量×移民流入	1.0698 ^{***} (0.2251)	1.0098 ^{***} (0.2187)	0.7257 ^{***} (0.2276)
行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常数项	0.0679 ^{***} (0.0126)	-0.0474 (0.0300)	0.1456 ^{***} (0.0529)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160	20160	20160
R ²	0.7005	0.7108	0.7126

(二) 基于受教育程度视角

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性是否会影响其分工促进效应? 本文使用 OECD 数据库中移民的教育标准分类数据进行检验。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 ISCED3 为高级中等,即高中教育阶段;ISCDE4 为中等后非高等阶段,即高中后的非高等教育阶段;ISCED5 为第三级教育第一阶段,包括学士和硕士教育阶段;ISCED6 为第三级教育第二阶段,且“通向高等研究资格证书”,即博士教育阶段。鉴于 OECD 只公布了 2000 年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数据,因此本文使用 2000 年的样本数据,将移民分为 ISCED3/4 和 ISCED5/6 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并进行费舍尔检验,计量结果见表 7。

表 7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分析

变量名称	(1) ISCED3/4	(2) ISCED5/6
移民流入	0.0327 *** (0.0029)	0.0352 *** (0.0029)
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1.7568 *** (0.2026)	1.7862 *** (0.2017)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观测值	1176	1176
R ²	0.7059	0.7108

表 7 列(1)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回归,列(2)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学士、硕士或博士)的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回归,分组回归通过了费舍尔检验。回归结果显示,高等教育移民流入的系数显著大于高中教育移民流入的系数,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往往具有更强的跨国社会资源,如企业外籍高管更容易通过直接的社会联系促成异国企业之间的生产合作;另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一般在母国和东道国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社会影响力有利于提高东道国正面形象和传统民族文化在海外的认可度和好感度,是全球价值链延伸的重要催化剂。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21 世纪以来,移民数量不断增长,跨国移民游走在不同国家之间,充当着国家间经贸联系的“桥梁”和文化交流的纽带,必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 2000—2014 年 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和 WIOD 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移民流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第二,移民流入主要通过降低搜索匹配成本和提升文化好感度两条渠道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第三,从制度质量视角看,制度质量越低的国家,移民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大;从受教育程度视角看,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群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更大。

本文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移民群体的作用,为全球价值链发展重塑提供了新思路。“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在华外籍群体,协助建立联系更加密切的在华外籍商会和华人华侨商会,发挥移民群体的“牵线搭桥”作用,深化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生产分工合作;其次,凝聚文化力量,积极规划在华外籍群体中的文化传播与合作项目。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兴媒体,让文化正能量在更大范围内有效传递,使双边文化上的交流成为经贸发展的助力,带动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经贸合作。最后,充分发挥现有高等教育移民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深化国家间高校及高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人才交流契机,激发经贸合作的潜力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RANIS G, FEI J C.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4): 533-565.

[2] TODARO M P. Urban job expansion, induced migration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a formulation and simplified empirical test for LDC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6, 3(3): 211-225.

[3] JOSÉ V. Does immigration help to explain intra—industry trade? evidence for Spain[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5, 141(2): 244-270.

[4] PARSONS C, VEZINA P L. Migrant networks and trade: the vietnamese boat people as a natural experiment[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12): 210-234.

[5] LUU T H.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FDI: can migrant networks foster investments toward origin countries? [R]. Honors Projects, 2019, No. 141.

[6] CUADROS A, MARTIN-MONTANER J, PANIAGUA J. Migration and FDI: the role of job skill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9, 59: 318-332.

[7] 孟珊珊, 王永进. 移民网络与企业进口扩张——基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J]. 经济科学, 2020(6): 48-59.

[8] 铁瑛, 蒙英华. 移民网络、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协定[J]. 经济研究, 2020, 55(2): 165-180.

[9] 余森杰, 吴双. 移民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J/OL].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3. [2023-02-1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066.c.20221107.1320.002.html>.

[10] TADESSE B, WHITE R. Do immigrants enh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the case of US tourism services expor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14(6): 567-585.

[11] HILLER S. Does immigrant employment matter for export sales? evidence from Denmark[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3, 149(2): 369-394.

[12] HEAD K, RIES J. Immigration and trade creation: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Canada[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31(1): 47-62.

[13] 魏浩, 袁然. 全球华人网络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1): 25-40.

[14] CARD D.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1): 22-64.

[15] OTTAVIANO G, PERI G, WRIGHT G C. Immigration, trade and productivity in services: evidence from U.K.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2(MAY): 88-108.

[16] BEERLI A, RUFFNER J, SIEGENTHALER M, et al. The abolition of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irms and workers: evidence from Switzerlan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3): 976-1012.

[17] RAUCH J E, TRINDADE V.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 84(1): 116-130.

[18] 蒙英华, 蔡宏波, 黄建忠. 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10): 54-64.

[19] 杨汝岱, 李艳. 移民网络与企业出口边界动态演变[J]. 经济研究, 2016, 51(3): 163-175.

[20] 魏浩, 连慧君. 国际劳动力流入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0(4): 1-16.

[21] STIGLER G J.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1, 69: 213-213.

[22] DIAMOND P A. A model of price adjust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1, 3(2): 156-168.

[23] JAVORCIK B S, OZDEN C, SPATAREANU M, et al. Migrant networ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94(2):231-241.

[24]岳云嵩,李兵.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基于“阿里巴巴”大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8(8):97-115.

[25]HUMMELS D,ISHII J,YI K.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1):75-96.

[26]KOOPMAN R B,WANG Z,WEI S J.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R]. NBER Working Paper,2010,No.16426.

[27]JOHNSON R C,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86(2):224-236.

[28]WANG Z,WEI S J,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 NBER Working Paper,2013,No.19677.

[29]WANG Z,WEI S J,ZHU K.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R]. NBER Working Paper,2017a,No.23261.

[30]WANG Z,WEI S J,ZHU K.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R]. NBER Working Paper,2017b,No.23222.

[31]胡昭玲,宋佳. 基于出口价格的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13(3):15-25.

[32]杨高举,黄先海.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2013(2):25-45.

[33]唐宜红,张鹏杨.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J].统计研究,2017(4):36-49.

[34]WEI S J. Intra-national versus international trade: how stubborn are nations in global integration[R]. NBER Working Paper,1996,No.5531.

[35]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1):1-21.

[36]TIMMER M P,LOS B,STEHRE R, et al. Fragmentation, incomes and jobs: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J]. Economic Policy,2013,28(76):613-661.

[37]BORJAS G. Immigration and welfare magnet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9,17(4):607-637.

[38]杨仁发,李娜娜. 产业集聚、FDI 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J]. 国际贸易问题,2018(6):68-81.

[39]HELLMANZIK C,SCHMITZ M. Virtual proximity and audiovisual services trad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5,77:82-101.

[40]刘斌,顾聪. 跨境电商对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统计研究,2022,39(8):72-87.

Immigrant Influx and Global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ZHAO Xiaof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mmigrant influx promotes the exchange of ideas, cultures and concept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drive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nevitably impos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By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from 2000 to 2014,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 influx on global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immigrant influx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and the robustness tests of indicator measurement and estimation method both prove the robust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immigrant influx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mainly

by the two routes of reducing search matching cost and enhancing cultural favorability; the lower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a country is, the greater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ts immigrant influx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and that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immigrant groups is, the greater thei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o fully play the role of promoting specialization by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China represented by foreign employe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anti-globalization, gather cultural strength, drive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production division.

Key words:immigrant influx; global value chain; anti-globalization; production division; intermediate product

(责任编辑 贾庆英)

(上接第 96 页)

Institutional Choice of C2B2C Urban Homestay

HAO Liyan, WU Sheng

(School of Law,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Driven by national policies and share economy, homestay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local management methods that are timid in creating and encouraging homestay development and the homestay platforms that avoid management recognize C2B2C urban homestay as house renting. Although C2B2C urban homestay is in line with the form of rental contract system, it has been regulated as business premises in practice, and academic theory also regards it as deviating from the essence of accommodation. If homestay platforms insist on choosing the rental contract system, they will have to pay the cost of converting accommodation to commercial use, and such a cost has no foundation in the investment-based residency system, for its investment attribute, legal entity, expansion object, income right, rentable nature and maintenance obligation are in line with homestay development. The freedom of creditor’s rights under the lease contract system can lead to frequent termination of C2B2C urban homestay contract, rapid rent increase and potential blind expansion. In contrast, the stable attribute of usufruct can help its stable development. Strong protection intensity of property rights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registration, determined consider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a lump sum, and income return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long-term limit.

Key words:urban homestay; investment residency right; institutional choice

(责任编辑 于林平)